

博士短论文丛 王梦奎主编

东方传统

DONGFANG CHUANTONG

李 凭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博士短论文丛 王梦奎主编

东方传统

李 凭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传统/李凭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1

(博士短论文丛/王梦奎主编)

ISBN 7-80087-259-9

I. 东… II. 李…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1889 号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 66180781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2 850 × 1168mm 印张: 7.125

字数: 156 千字 印数: 1—10100 册

定价: 12.8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 可向发行部调换

《博士短论文丛》编委会

主 编: 王梦奎

副 主 编: 朱 兵

执行编委: 蔡建国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宁宁 王家福 卢钟锋 刘 伟

刘世锦 米建国 李京文 李桐连

李培育 李善同 张 炯 张小济

张军扩 张卓元 陆学艺 陈吉元

陈锡文 陈筠泉 林毅夫 周叔莲

钟朋荣 郭励弘 程秀生 谢伏瞻

蔡建国 樊 纲 魏 杰

总 序

王梦奎

我国自 1980 年从法律上确立研究生培养和学位制度，1983 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以来，迄今已有 3 万多人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其专业领域之翘楚。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和毕业生数量还在逐年增加。虽然不能说这是青年人成才的唯一途径，但这些人将成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骨干力量则是确定无疑的。

美国学界有个笑话：“什么是博士？博士是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这种调侃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博士是学有专攻之人。人们看到，在现代科学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洋洋大观的博士论文，用数万言、十数万言，钩沉索隐，对某个具体问题，甚至

是比较偏僻的领域，进行深刻入微的剖析，见人所未见，甚至填补学科的某些空白，有开拓创新之功，其意义是不待言而自明的。

这套文丛不是通常所说的博士论文，而是博士所写的短论。博士应该是博学之士，“知道得越来越多”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知识和兴趣并不限于“越来越小的领域”。他们的文章，并不都是长篇巨制。更大量的文字，恐怕还是短论。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接触到更多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勤于用功的人，有感而发，往往要言不烦，独具慧眼，不论是专题论文抑或是随笔杂感，都能够不失其博士本色。在作者，短文章往往便于及时表达思想，也更难写；因为篇幅短，不容易发生“书券三纸未见驴字”的毛病。在读者，读这种短文章或许比读长篇大论更有兴趣。一般说来，不能抽象地谈论文章长好还是短好。但是，在生活节奏加快，读书时间不多，而言之无物的长文章还在流行的今天，公众是更喜欢读内容充实的短文章的。

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

是最高境界，浅入深出为文章大忌。这里有对所论事物认识深度的问题，也有文字表达能力和文风的问题。我读过一些博士的文章，觉得他们在努力继承前辈大家深入浅出的优良传统，这是令人欣慰的。当然，毋庸讳言，也有某些深入深出、浅入深出和文字晦涩的文章，这是需要努力改进的。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编者加以注意，也愿与作者共勉。

按照出版社的计划，大体上每个月出一本，每本专辑一个作者的短论，包括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只要认真选择作者对象，积之十年，就可以出版一百多位作者的短论专集，规模就相当可观了。这对于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很赞成中国发展出版社关于出版《博士短论文丛》的创意，并且写出自己以上的想法，作为序言。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目 录

· 学海孤舟	1
东方传统的政治思想	3
古人类学与古文化学	9
传统与现实	19
鬼谷子的文化背景	30
佛教与佛教文化	44
改良运动中创办起来的中国报刊	47
西方人在华办报活动述略	58
鸡鸣与斗鸡	69

· 书山蹊径	79
二吴与《古文观止》	81
王文濡与《续古文观止》	99
三部山志	109
盖棺未必成定论 遗山不独是诗人 ——略评《元遗山新论》	118
《水经注》的文采和意境	123
力空法师救护《赵城金藏》问题考实	137

· 史林片叶	149
大移民与雁北的开发	151
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两面性	168
魏晋南北朝时代妇女风情	17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豪侠风尚	185
北魏子贵母死故事考述	191
丝绸之路的起点	203
酈道元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209

学海孤舟



东方传统的政治思想

当文明的曙光穿透最后一层晨雾，人类社会迈进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时代之时，当部落联盟组织终于蜕变成为统治机器——国家之时，诸种政治现象就从野蛮社会的窠臼中萌发出来，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数千年漫长的历程，长成为社会之树上繁茂的枝条。在那枝条上年复一年地盛开的花朵正是各具时代特色的政治思想。其中，东方政治思想又别具风格。

在不断更新的政治思想中，国家几乎永远是议论的主要对象。正如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的那样：“国家一直是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

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 20 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暴力机构、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列宁的话道清了国家的本质。国家，从它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不过，东方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对于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类型及其变化、国家的起源与消亡的规律等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的，其间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渐进的过程。

上古和中古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往往将国家与社会，甚至将国家与君主等同起来，他们大多按照他们所属的阶级的立场去提出或描绘国家的理想状态，并将理想国家看成是一种所谓公正的、超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从而有意无意地将国家的阶级统治机器的本质掩盖起来。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日益深化，如黎巴嫩的纪伯伦、日本的福泽喻吉和印度的泰戈尔等人关于国家都有过十分精彩的言论。特别是泰戈尔，他在《民族主义》一书中认为，“在政治文明中，国家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且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功利关系。因为它没有在感情上扎根，所以它很容易被操纵。”泰戈尔的看法已经十分贴近真理，但是，由于他没有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研究和阐述，因而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国家的本质。尽管如此，东方各国对于国家的认识仍然是丰富的、宝贵的，对于与国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政府的职能、议会的

作用、官僚体制的产生与官僚主义的弊病等的认识也是深刻的。

东方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中央集权，因而在东方政治思想中长时期地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专制主义，古代与近代无不如此，直到今日，专制主义的思想依然在东方世界徘徊。东方专制政权通常是由一个独揽最高权力的人物来主宰的，他就是君主，就是所谓的皇帝、国王、汗或苏丹。即使在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人也还是君权的象征。只要不发生政变，君主就高踞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金字塔的尖端。君权至上的观点正是这种状况的具体的思想反映，在东方，尤其在古代的东方，它是不断地讨论的中心议题。所以，在东方的古文献中有着连篇累牍的关于君主权力的言论。在这些言论中，有不少是竭力抬高君主地位，宣扬君主至尊的。他们不断地往君主脸上涂脂抹粉，甚至于将君主捧到了与天齐高的地位。在印度，蚁垤将君主喻为“天帝”（《罗摩衍那·阿逾陀篇》）和“初升的太阳”（《罗摩衍那·童年篇》）；在波斯，拉施特将君主比作“世界之王、大地和时间的最高君主”（《史集·成吉思汗纪》）；在日本，将君主径直地称作天皇。

不过，君主毕竟不等于天帝，君主之权也绝非神授。君主的确立是统治阶级最高利益的需要，君主只是因这种需要而产生的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因而，统治阶级一方面要竭力地去确立君主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对君主的职责和君主个人的能力与品行提出种种严格的要求，并要求君主处理好他与国家、与臣民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君主所代表的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才能使专制统治持续下去。所以，在古代的东方，人们心目中君主的命运似乎是与整个国

家的安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代以后，东方的专制主义政权被一个一个地推翻了，君权至上的观念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日本天皇从“人间的神”降为人间的人的事实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如河原敏明在《日本天皇——裕仁》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随着武士势力的兴起，朝廷的权威衰退了，但根深蒂固的尊皇观念却仍然潜藏在每个普普通通的庶民心中。明治之后，把天皇美化为‘活着的神’，‘人间的神’，是居住在云霄的超人的神，强制国民畏服天皇。昭和年代军国主义的发展，日益强调天皇的绝对性，既把天皇当作盾，又利用天皇这个矛，久欲征服称霸大陆。这个野心越来越膨胀，终于落得了覆灭的下场。”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系国家命运于君主一身的观念却仍然时有反映。因而，皇帝、国王、汗和苏丹虽然不存在了，民族领袖、政府首脑却依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占据着崇高的位置，他们在整个社会之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现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对于领袖与首脑的地位与作用也有了崭新的看法。

东方各国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传统，因而在关于政治的概念、政治的作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也有丰富多彩的思想言论。在上古与中古，东方各国几乎都注重为政之道，希望善政，反对暴虐，目的是为了长治久安。而在近代与现代，则十分注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治目标、政治路线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对比，目的是为了寻求本民族与国家的出路。此外，在阶级社会中，追求政治权力的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贯穿始终

的，东方世界不仅不例外，而且因漫长的专制主义统治而表现得更为激烈和复杂。因此，围绕政治权力与政治斗争而发表的言论在东方政治思想中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在古代专制主义极权统治之下，被统治阶级是不允许有政治思想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向国家缴纳抽不完的苛捐、杂税，为国家服无尽的徭役和兵役。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遵循符合统治阶级的一切法令。这在《一千零一夜》的《国王赭理尔德和太子瓦尔德·汗的故事》中谈得再清楚不过了：“忠诚遵循命令，严守法律，舍身救国，凡君主乐意而不违背教律的事全都奉行，并歌颂其德政，这一切都是庶民对君主应尽的义务。”不过，被统治阶级虽然尽了繁重的义务，却几乎毫无权利可言。所谓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在古代的东方几乎是不存在的。那时候，虽然也有这一类名词和提法，但与如今提倡的平等、民主与自由的概念并不一致。例如，在《一千零一夜》的《陶望督督和学者答辩的故事》中也谈到了所谓的自由，称“圣行是自由的，天命是强制的”。这里所说的自由与现代意义的公民的自由权利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一些历史学家将古代的自由与民主称为乞丐式的自由、乞丐式的民主，这是很有道理的。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平等、民主和自由等公民的权利逐渐地响亮了起来，成为时髦的口号。由于对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的逆反心理，东方各国人民争取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迅速、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其气势并不亚于西方本土。许多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注意到了平等、民主与自由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并且将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结